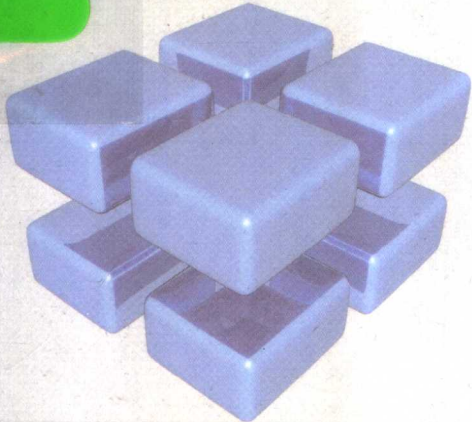


社会科学知识新论

石之瑜 / 著

文化研究
立场
十评

SHEHUI KEXUE ZHISHI XINLUN



SHEHUI SHEHU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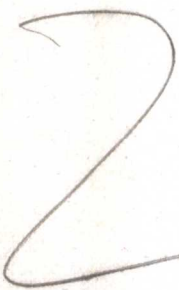
KEXUE ZHISHI KEXUE ZHISHI

XINLUN XINLUN

WENHUA YANJIU WENHUA YANJIU

LICHANG SHIPING LICHANG SHIPING

本书的置心放在文化研究对科学主义的主要挑战上，以厘清那些跳跃无目的科学主义窠臼，重新思考知识之性质系列，产生爆发式之突破。进而反思当代社
科学与政治知识的意义，各章均用强迫对话的方式，针对具体的问题逐层、层层递进的研究以回与方法论。既引自来自文化研究界对于社会科学主义的确切检讨，也探讨
文化研究对于社会科学知识如何与超越。本书在本书作者的论述中，出入中外各家，在路途中我生主义的之中，表现作者的思想和他的思索，值得不同学精神
最的笔名和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G301
38

社会科学知识新论

SHEHUI KEXUE ZHISHI XINLUN

文化研究
立场
十评

石之瑜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科学知识新论:文化研究立场十评/石之瑜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1

ISBN 7 - 301 - 09776 - X

I. 社… II. 石… III. 科学主义 - 研究 IV. G3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6692 号

书 名: 社会科学知识新论——文化研究立场十评

著作责任者: 石之瑜 著

责任编辑: 都 娟

标准书号: ISBN 7 - 301 - 09776 - X/C · 037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排 版 者: 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82350640

印 刷 者: 北京原创阳光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6.5 印张 222 千字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自序

自西潮东渐,百余年来士林动荡。民族自信既溃,全盘西化思想无处不在,影响人文社会学界尤烈。士子文人偕革命志士,莫不以德营与赛营为基,力图去封建专制而后已,从而与统治集团及其御用文人,不时奋激交搏。查其人数尚微,寸铁均无,竟仍酿成气候,颇领风骚。

曾几何时,科学主义与自由主义渐入庙堂,终为统治阶级专擅,竟日益为之擦脂抹粉。前此传道授业之耆宿惊骇不已,或老成凋零,或隐退自求。以致新锐学者不知何以来,不知所以往,上焉者钻研科学技术,下焉者钻营党政人脉,所谓科学与自由,垄断身份与切割历史之武器而已矣,不复为庶民开太平之学。重振士林,更待何时?

夫科学患其大恙,在不察科学之根源非属科学也。故随统治集团习性各异,科学所生社会政治效用岂有相同?列国科学家常见雷同遭遇,其求真精神与自由思想,或为极权霸业亟思封锁,或为殖民母国所巧妙操弄,常不自知。科学家脱其文化历史徒成匠,盖失其方向使然。

尝窃思西学不改,士林不振。故四海游行,朝录野言,夕出异文,虽皆逆耳之言,至舌燥口苦,不知不觉且砌成此集。内中直指科学为术,自由为戏,又妄念后浪淘淘,随意出戏入术,任情自为,而能不为霸业所缠,不受名器所困,还归庶民,以成新知,以御生机。不幸显学呼啸于上,小人围欺于下,如今大将杳渺,廖化乘鹤,重振士林,更待何人?

石之瑜

甲申年八月廿七日

应特别强调东亚经验的重要性

黄俊杰

石之瑜教授将他近年来在各地讲学所撰写的论文,汇集成为专著,曰:《社会科学知识新论——文化研究立场十评》。承石教授的好意,先让我拜读全书稿本,并希望我写一些读后感言,我深感荣幸。

这部书在五编共十章的论述中,涉及的课题至为广泛,但是全书各章都环绕着一个主题:对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主流论述地位的科学主义之批判与反省。石教授在本书各章通过对于科学主义研究方法论及其实践的批判,企图解构以科学主义为基础的主流论述及其霸权结构,强调文化研究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从而唤醒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他者”的平等对待,以及对于弱者(如少数民族)的关怀之情。石教授在本书各章的论述中,出入中外各家,在略带后现代主义的文风之中,处处显示他对于科学主义的不满,也流露出他的悲天悯人的胸怀。我的专业领域是东亚思想史,我是一个社会科学的门外汉,对石教授这部书中有关政治学研究的专业问题,我完全没有发言的资格。对于石教授的诸多论点,我也不能赞一词。但是,在通读全书书稿之后,我觉得这部书对于“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或“东亚研究”(East Asian Studies)工作者而言,确实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课题与论点,其中最具有方法论意涵的有以下两个问题意识:

第一个问题是:在 21 世纪全球化时代里,“中国研究”对于社会科学理论的建构有何意义?石教授在本书各章的讨论中,时时激发读者沉思这一个重要的问题,例如石教授在本书第二章以孟子的“鱼”与“熊掌”的比喻,批判以科学主义为基础的主流社会科学理论建构者,就像蜘蛛结网一样,不可避免地陷入自创一个天地,又被这个天地所囿限的困境。因此,石教授在



第三章提出,作为方法论的全球化论述,正是在于引导本土人思考自己在全球格局中应有的位置,从而加强人的自我理解与自我实践。石教授在本书第四篇的第七、八两章,更进一步引导读者深思“中国研究”对21世纪社会科学科学研究的新意义。

关于这个问题,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界业已有所碰触,但是在那一个欧风美雨挟其坚船利炮强力冲击中国思想海岸,中国知识界新旧失衡、中西断裂的时代里,中国学者思考这个问题常不能免于激越之论断。举例言之,哲学家熊十力(子贞,1885—1968)认为西方社会学说不适用于中国历史研究^①,社会史家与思想史家侯外庐撰写《中国古代社会史》,却是企图以中国历史经验作为马恩理论的亚洲版本之注脚。^②这些针锋相对的意见隐约间指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历史经验之间存有某种紧张性,不是中国屈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就是完全将中国经验视为社会科学普遍理论的例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上述激越的两极意见稍获纾解。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AS)曾邀请美国著名汉学家勒文逊(J. R. Levenson)、莱特(M. C. Wright)、史金纳(G. W. Skinner)、弗里曼(M. Freeman)、牟复礼(F. W. Mote)、崔启德(D. C. Twitchett)及萧公权先生等人,各撰专文讨论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之关系,集结成:“Symposium on Chinese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刊于*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XIII: 4 (Aug., 1964), pp. 505—538; XXIV: 1 (Nov., 1964), pp. 109—114。这些战后优秀的汉学家都认为“中国研究”与社会科学应密切合作。国际汉学界上述这种理想,事实上并未能在汉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实务上充分落实,所以已故人类学家张光直(1931—2001)在1994年仍不免呐喊:“为什么在20世纪的学术研究上,中国对人文社会科学作一般性贡献

① 熊十力:《读经示要》(卷2),(台北:广文,1970),第67—68页。

② 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中国学术研究所1948年版,“自序”。



的潜力完全不能发挥？”^①现在石之瑜教授这部书，以更为鲜明但更为深刻的方式，重新提起这个问题。从方法论的立场而言，我很同意石之瑜教授建议通过文化研究而批判、矫治社会科学主流论述，并补其所不足。更具体地说，任何社会科学理论如果不能充分地将中国数千年的经验纳入考量，并能解释中国经验之所以然，则这种理论就欠缺普遍必然性，而终不免成为一偏之见。

我们以历史社会学家埃森西塔(S. N. Eisenstadt)为例阐释这项看法，埃森西塔著有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Empir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Historical Bureaucratic Socie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3, 1939) 一书，此书也有中译本，即阎步克译：《帝国的政治系统》(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此书试图对世界史上所见的各大帝国之政治系统，提出一套圆融的解释。

埃森西塔的学问与二战以后的欧美政治学的思潮桴鼓相应。传统的政治学研究主题大多重视各国静态的政治制度而较少涉及政治行为与政治过程，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政治系统的运作及其过程一变而成为政治学研究之主要课题，诸如“投入—产出”(input-output)、“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政治系统”(political system)之类的名词乃应运而生。首先把“系统”这个观念用来构成一个理论系统的是大卫·伊士敦(David Easton)，他的《政治系统》(*The Political System*)一书于 1953 年问世。埃森西塔的政治系统论与伊士敦、阿尔蒙(G. A. Almond)、阿卜特(D. F. Apter)等人的学说关系密切。埃森西塔的《帝国的政治系统》一书从政治系统论出发，研究人类历史上实行中央集权化的官僚政治帝国的政治系统。埃森西塔主张：历史上的官僚帝国的统治者，居于政治系统的最高层，发号施令，运用社会资源。埃森西塔分析帝国的政治系统之时，非常强调治水事业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古代帝国政治运作的重要性，他认

^① 张光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该跻身世界主流》，《亚洲周刊》[香港]，1994 年 7 月 10 日，第 64 页。

为水利事业是中华帝国的基础。但是,埃森西塔的“帝国政治系统”理论,由于对中华帝国历史经验的不熟悉,而出现严重的破绽,我过去曾有所讨论。^①

相反地,如果社会科学理论的建构者,能够将中国历史经验纳入考量,那么,其理论的周延性与普遍性必然大为提升。二十多年前美国社会学家史柯普(Theda Skocpol)分析世界近代史上的社会革命的论著,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史柯普将法国、俄国与中国革命的经验,放在比较的视野中加以分析,提出许多创见,对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与列宁(Vladimir Lenin, 1870—1924)的许多学说,既加以吸纳融会,而又提出修正。史柯普的书之所以能在社会革命理论中有所创新,主要可以说得力于她在西方历史经验之外,再将中国经验纳入考虑,从而在三个革命经验中既求其同,又见其异。从史柯普的例子,我们看到了中国经验在建构社会科学理论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②

我举埃森西塔与史柯普两位社会科学家为例,说明中国经验对社会科学理论的建构,所具有的不可或缺性。石之瑜教授这部书的许多论点,都启示读者: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里,社会科学必须更加注意具体性与特殊性,才能更具有普遍必然性。我想在这里进一步强调的是,石教授在这本书中时时涉及的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新思潮,多半源起于欧洲或北美,较少以中国历史经验以及当代东亚社会政治情境作为论述之参照系。因此,石教授所强调的“文化研究”,应特别强调东亚(尤其是中国)经验的重要性,才能使社会科学论述的“普遍性”不流为“霸权论述”,也才能同时照顾理论与实践两个面向。

石教授这部书引导读者深思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研究”的知识论基础是什么?这个问题在21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界特别值得反省。石教授呼吁应将“中国研究”作为对象加以研究,他在本书第七章开宗明义地指出:

① 参看黄俊杰:《埃森西塔对帝国的政治系统之研究及其对中国历史之解释》,收入:黄俊杰编译:《史学方法论丛》,(台北:台湾学生书局),第157—186页。

② 参看 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London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所谓将中国研究领域当作研究对象的意义有两层，一是将既有的中国研究文献搜集，进行文献的比较分析，既比较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也比较理论角度、历史分期与议题种类等。另一层是比较研究者的身份与位置，反省研究者所从出的历史脉络、生活经验与专业训练对研究活动的影响，并追问研究者所属机构的性质和研究经费的来源。必须对中国研究本身进行研究，才有可能更全面、更深入地体会中国研究者所提出的相关知识，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石教授进一步阐明他所谓“以‘中国研究’作为研究对象”，所涉及的问题：

首先是问，关于中国作为研究对象，是什么意义的对象？亦即本体论的探究，可大别之为无本体论与有本体论。其次是在有本体论的预设下问，关于本体的知识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再次，是在客观知识的预设下问，中国相关知识是属于普遍性知识的一环，还是不可与其他知识共量的特殊性或相对性知识？接着，是在普性知识的预设下问，这个知识是否具有历史终极目的与通往目的之单一途径。然后，是在线性历史目的论的预设下问，取得中国知识的方法论依据，是自由经济制度主义的问题意识还是唯物主义史观？最后，是在自由经济制度主义的方法论预设下问，采用归纳的历史方法和演绎的理性抉择方法之间有何实践意义上的差别？

石教授以上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在海峡两岸人文社会科学界尚未获得充分的注意，但在日本知识界却有许多学者进行过严肃的思考，可以作为我们反省这些问题时的“他山之石”。

日本研究鲁迅的著名中国文学研究者竹内好（1910—1977），曾有一篇题为《作为方法的亚细亚》的演讲稿^①，中国思想史研究学者沟口雄三

^① 竹内好：《方法としてのアジア》，收入：《竹内好全集》（第五卷），东京：筑摩书房 1980 年版，第 93—94 页。



(1932—)撰有《作为方法的中国》^①一书,研究日本思想史的子安宣邦(1933—)也有《作为方法的江户》^②一书,对于思考亚洲、中国或日本的方法,都各自提出一套看法。

竹内好等三位日本学者对于“亚洲(中国、日本)应如何被思考?”这个问题的意见,固然互有出入,而且沟口雄三曾批判竹内好对中日两国近代以前的历史缺乏了解,子安宣邦也不满意沟口雄三对近代中国革命在感情上过度的投入,但是,这三位日本学者都有心于跳出近代西欧“近代化”的模式,重新解读东亚近代的历史经验。竹内好认为20世纪中国从孙中山(1866—1925)到毛泽东(1893—1976)的革命,是在摸索中国模式的近代化道路,而不是照搬欧洲的经验。竹内好认为20世纪中国近代化的“方法”,有助于亚洲人正视亚洲经验之特质。沟口雄三认为,思考近代中国的发展,必须注意其异于欧洲的特质。他强调,世界史的普遍的面相,只有通过个别的独特性才能获得彰显。^③沟口雄三提出“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的研究愿景。^④子安宣邦批判过去有关江户时代日本的研究,常以近代西欧作为参照系。他认为应从江户时代内部重新解读江户。

竹内好等日本学者所谓“作为方法的亚洲”、“作为方法的中国”以及“作为方法的江户”的提法,与石之瑜教授所谓“以‘中国’作为研究对象”的提法,有其同调亦有其异趣。双方之所同者在于:石教授与日本学者一样,都有心于超越并扬弃以西方为中心的所谓“霸权论述”,他们都不满于以近代西方发展经验为基础的一元化的、不能容忍“异己”的研究立场与视野。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之内向往一个多元多样、五彩缤纷、“万物静观皆自得”的世界。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中,诸多主体之间(包括个人、国家、文化等)呈

① 沟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国》,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版;李苏平等译:《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② 子安宣邦:《方法としての江户》,东京:ペリカン社2000年版。

③ 参看沟口雄三:《“中国の近代”をみる視点》,收入:《方法としての中国》,第3—35页,尤其是第30页。

④ 同上书,第137页。

现牟宗三(1909—1995)所谓“并列原则”而不是“隶属原则”。^①这是一个寓有后现代意趣的文化世界与学术世界。

再进一步来看,石之瑜教授与这三位日本知识界知名学者之间仍有其重大的差异在焉。石之瑜教授所谓“以‘中国研究’作为研究对象”,他所关心的是“中国研究”学者的“身份”和“位置”,亦即研究者的知识论基础、阶级立场、价值定位等研究活动的“内在”问题。石教授在本书第一章对这些问题有详细的讨论。但三位日本学者所谓“以亚洲(中国或江户日本)作为方法”,所关心的焦点在于扬弃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并从亚洲(中国或江户日本)出发思考。他们企图发掘并突显亚洲(中国或江户日本)之不同于欧洲的特质,从而建立亚洲(中国或江户日本)的独特性与自主性。他们思考亚洲(中国或日本)研究的相关问题,比较偏向于研究活动的“外部”问题。

以上是我诵读石之瑜教授这部新书时,从我的研究领域出发所看到的这部书所激发的两大问题以及它们对我个人思考上的启发。就其整体而言,本书是一部充满作者慧识的作品,值得不同学科背景的读者细读。

序于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

2004年12月25日

^① 参看牟宗三:《中国文化的省察》,(台北:联经,1983),第68页。

应特别强调东亚经验的重要性



科学主义必须“谦卑执政”

管中闵

之瑜兄将出版其近作《社会科学知识新论——文化研究立场十评》，嘱我为序。这个要求来的蹊跷，我本身毫无政治学训练，所从事的研究又与文化研究完全搭不上边，这样的书怎么可能由我作序？我认识之瑜兄是在任教于台湾大学经济系时期，当时他几篇议论时政与两岸关系的文章，论点独树一帜，而且言人所未敢言，我因此主动请教，遂相结识。我既知之瑜兄一向特立独行，故认为此书必有不同于流俗之处，序言未必可以增色，但我个人肯定可以沾光。因此我虽然对写序之请感到迷惑，却一口应允。

如同前言所说，全书重心在于提出“对科学主义的主要挑战”，以期读者能够跳脱“无所不在的科学主义霸权”，重新思考社会科学的性质与意义。书中不仅不承认科学主义知识论所强调的外在客观结构，也认为社会科学主义学者追求对于人类行为的普遍性解释，反而会造成封闭的理论系统。由这些基本论点出发，书中对现存的全球化研究、少数民族研究以及中国研究中追求或套用普遍论述的批判就显得顺理成章了。如果这些理解是对的，我似乎已经猜出之瑜兄找我写序的原因了。

经济学一向是社会科学中自诩为最接近科学的一个领域。经济学家（尤其是经济计量方法与实证的研究者）特别注重资料数据，强调量化分析，以求发现经济活动中客观的普遍性规则。作为一名以经济计量为专长的学者，我显然会被归类于“科学主义霸权”的一方，甚至是“霸中之尤”。那么之瑜兄的用心于此“昭然若揭”：由受批判的一方写序，一方面正符合全书“强迫对话”的设计，另一方面也可由序中可能出现的“霸权”说法来反证书中论点。但是即使强调客观性与普遍性，我们许多基本想法其实未必与



书中论点互为桎梏。

经济(计量)学者习惯于采用模型来描述经济行为,借由资料验证模型的适用性,然后根据这些“客观规律”对过去的现象提出解释,甚至预测未来的变动。但是我们从不认为这些通过模型所发现的“规律”即是经济现象的全部。相反的,我们一直承认自己的局限性,认为这些模型只能捕捉经济现象的一部分,经济个体的许多殊异性则未必可由一普遍规律(或模型)加以刻画。因为承认模型不是全部,通过模型所描述的经济现象就只具有“代表性”,而不会是无所不包的普遍因果关系。也因为承认模型与实际之间存在误差,一方面使得模型化的解释仍有继续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则使历史、文化甚至心理等非模型的解释成为可能。

即使我们将自己限制于模型所能分析的范围内,这些依据模型所建构的“客观规律”(如假说与定理)也不会只是封闭的理论体系。对于经济现象,我们常常看到本质相异的两种(或更多)模型彼此竞逐,互相质疑,乃至出现执两用中,尝试包容各方的综合理论。竞争促使各方推陈出新,而无封闭的可能;商品市场如此,经济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市场亦复如此。经济学家常宣称发现了某些 stylized fact。正因为只是 a stylized fact,而不是 the fact,所以它是可以被挑战,也应该会被修正的。换言之,经济学家所认定的客观规律性既非绝对,也不是唯一;理论市场的开放保证了经济学界的源头活水,也使得这些客观规律得以与时俱进。

然而在发现社会的“客观规律”上,经济学家的努力也非无往不利的;资产市场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经济学家早就能将个体投资行为分析得头头是道,投资者的理性行为是在追求获利与规避风险中求取平衡。然而个别投资者的行为集中到公开市场之后,经济学家却赫然发现资产价格似乎不存在任何“规律性”,也因此无法预测。证券市场如此,期货市场与外汇市场亦然;美国市场如此,世界各国较为成熟的市场亦复如此。这种“不存在规律性”的现象经济学家将之化约为“市场效率性”,因此仿佛又呈现了某种客观规律。但是此一现象的普遍存在自然激发更多学者前仆后继的投入,



以期找出尚未被发现的客观规律。科学主义的深植人心由此可见一斑。

至此我们也应该问：为什么一定要执著于辨认出客观规律？西方的科学发展过程显示，通过客观规律的发掘与确认，知识得以系统化的累积，因此有利于向下扎根，也利于向上持续拓展。由自然科学而社会科学，这种做法构成了知识蓬勃发展的坚实基础。一旦摒弃了客观规律的追求，知识难免成为各说各话，有时可以是黄河之水，有时又如九天笙鹤，无所追寻，亦无从掌握。即以本书为例，若无客观规律，第四章中本土社会科学的四种台湾观点将如何归类？第六章中的“类英国学派”又将如何铺陈？我也很难想象，若非清楚掌握了社会科学许多学说中的规律性，之瑜兄如何可以在书中自由出入于各种流派与方法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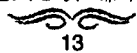
但或许是为了实践理念，全书多半的篇幅是主观论述，甚至不乏对受批判对象的文化想象，横看成岭侧成峰，却缺少了客观论证与更系统性的说明。至于书中文字则恣意挥洒，羚羊挂角。这些可能都是文化批判（或之瑜兄自己）的论文特色，但显与科学论文的要求大相径庭。这种论述方式可能宜于宣讲，却未必适合传授。文化批判论者在全力检讨科学主义的霸权之际，或许也该反躬自省为什么不易引起共鸣。而我相信，唯有适当撷取科学主义的优势，文化批判才有可能形成更清楚有力的“参照系”。

在可见的未来，我相信科学主义仍将是社会科学的核心价值。但是坚持科学主义的研究者若抛弃了历史文化脉络，也不正视外在更真实的环境，就难免自限于狭小封闭的房间。有此体认，本书的价值就清楚浮现：它为科学主义者打开了一扇窗口，吹入一丝凉风，提醒我们未来在学术的追求上必须更敬谨从事，避免不加细查的套用模式，避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也要避免粗暴地坚持普遍法则。科学主义者只要能“谦卑执政”，坦然面对文化批判，随时反思自己在建构知识时的角色与地位，那么科学主义的包容性与可修正性将会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观照整个社会。

谨以此代序。

甲申冬月于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

科学主义必须“谦卑执政”



野狐之瑜

王逸舟

接到台湾大学石之瑜教授电话,邀我为他的新书《社会科学知识新论:文化研究立场十评》写个序。连连告饶却不被豁免,无奈之际的我,只能信手涂鸦般地写几行字,打发宝岛来的这位“神圣”。

据笔者看,之瑜像一只活跃在黑山幽水的野狐,敏捷的身手、锐利的牙齿、坚韧的脾胃和不停的搜索,使之总能找到别的动物找不到的食物。他从来没有“大牌海归”和职场老道的架子,相反(譬如说)一进篮球场就变成了臭汗烘烘、争球好胜的男生,转眼间进入学术会场又体现出知识人的睿智与固执。我听说,台湾有不同派系的政客总想拉他入伙,可这个“狡猾的家伙”总是王顾左右、推三阻四。看着他那身材略显瘦削、挂着助教眼镜、一副总毕不了业的博士生外表,想想他的轶事与作品,佩服之余我也略感诧异,之瑜在那政治浊水横流的地方何以洁身自好,在那金钱铜臭没脚之处何以学术锥立?据我的观察,他缺少虎狼的凶残和斗鸡般的张狂,也做不出绵羊的温柔和一排歌鸟的悦啼,只能像狐精那样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巧妙觅食并学会自我保护。这种动物在物种学词典里简明易查,但在那个不算小的岛上,石教授有如同族的异类、难觅的少数。

之瑜的外表似野狐,形上的特质更甚。不仅在台湾,即便算上大陆,以中文写作的政治学学者里,依我的孤陋寡闻,似乎很少有谁像之瑜这样涉猎广又获取多。他的本行归类为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兼攻中国大陆社会政治研究(这在台湾当然属于显学),可他还写诗,研究女权主义、后现代现象和一般心理学,探讨“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民”(这可不是“台湾人”时兴的话语),且后几类都有专著问世。在之瑜洋洋洒洒写就的五十多本中英文作品

里,《社会科学知识新论——文化研究立场十评》当属最新出版的一部。这本书表现出作者在科学方法论方面的独到探索,单看其中的一些章节标题,我便自知不知其大、遑论妄加评说:《找鱼:后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异己伦理试论》、《全球化的方法与反方法:疆界作为游戏规则》、《中国知识的归类:脉络的拼凑、累读与开展》、《文化研究作为政治学次领域:能否?应否?》以及《少数民族作为方法:团结论述之外的能动性》——看看诸如此类的标题吧,除了聪明、胆大的学林狐精,谁敢这样纵驰而无羁?

私心里,既为之瑜服膺,也有一丝担忧,恐他的宏论跨度太大以致迟滞深度聚焦,怕此书的视界太宽从而连累有“一根筋”特点的读者的阅读。我想到了“谨守家门”的提示,还联系到本人经历的某些教训。但愿这仅是我类呆板学人的烦恼,高人智者如之瑜大概会付以洒笑,明白的观客亦不会被一只狐狸引得乱转。

瞎说一气,不像正经的序。之瑜兄可别怨我。

2005年8月6日写于京城家中

前 言

国内杰出的政治学研究者如胡佛、吕亚力、陈义彦、刘义周、朱云汉、黄纪、吴玉山等人，推展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代代相承，带动国内政治学界与国际主流接合，贡献卓著，使得政治学作为科学化程度相对较低的一门社会科学学科，近年来情况明显不同，已经不再是吴下阿蒙。另一方面，关于政治学乃至于社会科学的内涵与意义，在世界各地则正受到诸多其他知识立场的冲击，警惕着知识界不能满足于停留在对科学的某种固定认识上，而仅将希望全部寄托于科学主义前沿的开展。由当代政治知识相关文献的趋势观之，若凭借既有的研究议程，来单独因应风起云涌的各种知识反省，甚或试图融消或旁置之，已经造成知识界出现对话平台流失的危机。然而，由于国内政治学与一般社会科学研究科学化起步不久，在奋力追赶的过程中，另外要求抽出余暇来响应科学主义受到的挑战，难免力有未逮，因此有关社会科学知识论的中文文献，难以涵盖这一块丰富的知识论场域，以致莘莘向学的后起之秀，在浸淫政治科学技术之余，未必充分掌握到当代社会科学知识的纷杂意涵。

为了培养对这一块知识论场域的关照之情，孕育学界容纳不同知识立场的态度，并开启彼此对话的机缘，本书的写作将重心放在对科学主义的主要挑战上。各章均采用强迫对话的方式，直接提出文化研究者对于当前主流社会科学研究的省思，针对具体的研究议程，铺陈迥异的研究设问与方法论，既引介来自文化研究学界对于社会科学主义的检讨，也探究文化研究者对于社会科学知识如何另辟蹊径。借此批判精神的实践，使读者也对知识之性质为何，产生继续探究之兴趣，进而深思当代社会科学与政治知识的意义，摸索自己的立场，开辟有助于鼓励对话的研究态度。

值此社会科学界戮力追赶美国科学主义潮流的历史时刻，本书所探讨